



中日网

--- 以史为鉴 面向未来

当前位置: 首页 > 研究专题 > 中日关系 > 论文

从民间外交看中日邦交正常化——1949年—1972年

发布时间: 2010-06-25 点击次数: 252 作者: 许?琳

【文章摘要】日本是中国的近邻，中日两国有着友好交往的悠久历史，但二战中，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在中日关系史上留下了沉重的一页。二战结束后，当时的日本政府采取追随美国、敌视新中国的政策，导致中日关系长达20余年的不正常状态。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强烈反对日本政府的错误选择与顽固立场的同时，并没有由于中日之间存在的不正常状态的形成而无所作为。相反，在朝着中日邦交正常化，发展中日两国，特别是两国人民间的友好关系的总目标下，制定了一系列的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的方针政策，使日本国内主张日中复交的人越来越多，也使中日邦交正常化具备了日益强大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终使两国实现正常化。

【关键词】民间外交；贸易三原则；邦交正常化

新中国成立后的中日关系发展，实非坦途，历经20余年的曲折磨练。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既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呼声，也是两国人民多年努力的结果。战后中日关系的曲折变化，除了当时特殊的国际环境外，实际上受制于中日两国政府制定的相互政策。战后吉田茂、岸信介等几届日本政府错误的对华政策，是导致中日关系长期处于不正常状态的根本原因。日本政府把日台“条约”和日台“外交”关系的绞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后，即使鸠山一郎、池田勇人这样比较开明，主张在中日关系上有所作为的日本政治家，也被其缚住了手脚，迈不出关键性的步伐，直到田中角荣才把这个绞索解开。1972年9月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客观而论，是由于田中有顺应时势，顺应民心，顺应中日关系发展大潮的胆识。但是如果没有20余年中日民间外交的积累，没有两国人民间友好关系的发展，田中即便有勇气和胆识，也难以打开中日邦交正常化之门。而这一切，又是与中国政府制定的民间外交、以民促关、官民并举等正确地对日政策分不开的。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至50年代的民间经济外交（1949年—1957年）

1、新中国对日政策的初步形成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美国实现了对日本的单独占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为了把日本变成其远东的反共战略基地，迅速改变了以往的对日政策，其表现之一便是决定加速对日媾和的进程。由于美国政府的不断施压，当时日本的吉田茂政府与台湾当局签订了《日台条约》，双方建立了所谓的“外交关系”，这引起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极大愤慨。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坚决反对吉田政府的“两个中国”政策，指出：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

《日台条约》的签订和日本与台湾所谓“外交关系”的建立，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日本建立正常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的通道暂时被堵塞，在日本不废除《日台和约》，不中断同台湾当局的“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中日之间已不可能通过正常的外交方式来发展两国官方关系。如何打开对日外交的困难局面，成了中国外交活动的一个难题。既然官方难以启动，中国政府和领导人便开始决定以民间外交、人民外交的方式，去改变中日关系的僵局，发展中日两国人民间的友好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大日本人民和众多日本有识之士纷纷要求恢复中日之间的传统友谊，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新中国成立前夕，日本经济界的有识之士，相继成立了三个旨在促进日中贸易的团体，即“中日贸易促进会”、“国会议员促进中日贸易联盟”和“中日贸易协

会”。这几个团体都以发展中日贸易为己任。同时，中国政府亦开始重视同日本的贸易关系。1952年6月1日，中日第一个民间贸易协定——《中日贸易协定》在北京签订。

中日贸易协定的签订，推动了中日经贸关系的起步和发展。1952年9月下旬，日本“前进座”歌舞伎著名演员中村玩右卫门、一桥大学教授南博、巴商事株式会社社长樱井英雄等人组成的日本和平代表团，应以中国为东道主的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邀请，不顾吉田政府的种种阻挠到北京。在此之后，越来越多的日本各界人士加入到中日民间外交的行列，为中日经贸关系和文化交流的发展，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奔走呼号。中日民间外交活动的开展，促进了中日双方工商业界人士代表团的互访。1953年10月，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与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签订了《第二次中日贸易协定》。

50年代初，中国政府还努力妥善解决好日本侨民的安置或回国问题，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受到阻碍的情况下，积极主张利用民间外交的方式，发展两国人民间的友好往来，这为以后“以民促官”方针的正式提出和实施，为两国民间友好往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民间往来、官方挂钩方针的制定与实施

1954年12月，一贯追随美国反华反共的日本吉田茂政府垮台，代之以奉行“自主国民外交”的鸠山一郎上台组阁。鸠山是在反对吉田的独裁统治和对美“一边倒”的外交路线的背景下上台的。因此，外交方面，他提倡开展“自主国民外交”，表示要发展对中国、苏联的贸易与往来，并把改善日苏、日中关系作为对外政策的基本点，以此打开对外关系的僵局。对于日本政府对外政策的这一新变化，中国政府立即做出反应，表示欢迎。

中国政府在期待和敦促日本政府为两国关系正常化采取切实可行的步骤的同时，更为重视两国人员来往和经贸联系，从强化民间往来入手，以开展国民外交的方式，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1953年9月，周恩来总理会见了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主席大山郁夫，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日之间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中国总理接见的第一位日本人。1954年10月，中国派出了以红十字会总会会长李德全率领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对日本进行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向日本派出的第一个访问团。代表团的访日，打破了中日民间交流只有日本人士来中国，而无中国人士去日本的单向交流局面，从而使中日民间往来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鸠山执政期间，是中日民间友好往来得到发展的时期。从1955年到1957年初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国开始了以争取邦交正常化为目的，不断扩大经济文化交流的“积累方式”，使中日关系有了较大的发展。在民间外交的推动下，两国官方也开始了接触，使中日关系由民间往来向着以民促官的方向发展。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第三次中日贸易协定的签订以及中日渔业协定的签订。

50年代中期中日关系较之50年代初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这固然与鸠山政府采取了与吉田政府有所不同的对华政策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针对日本国形式和外交政策的变化，在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日本政府必须坚持一个中国立场的前提下，适时调整了自己的对日策，对鸠山在改善中日关系上所起的作用给予充分的肯定，并认为日台“和约”的废除，不一定是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前提，而是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的目标和结果。

正因为中国政府在发展中日关系上采取了灵活而真诚的态度，坚持了原则的决定性与政策的灵活性的统一，加之鸠山政府对发展中日关系尤其是经贸关系也作了一定的努力，在鸠山执政期间，中日关系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两国人员往来增多，经贸规模扩大，官方接触开始。

二、中日关系的全面断绝（1957年—1960年）

1、50年代后期中日关系的逆转

1957年岸信介就任日本首相一职，在他的任期内，中日关系不仅未有发展，而且由于其顽固地坚持反共反华政策，导致50年代中后期中日关系的大幅度逆转。

岸信介上台不久，立即展开对东南亚、南亚、台湾及美国的访问，他以自己的言行公然露骨地表现出反共反华、敌视新中国的立场。尽管岸政府也表示要在“政经分离”的原则下扩大同中国的贸易，但在涉及两国经贸关系的具体问题时，却对中日贸易采取破坏的态度。这集中表现在对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的签订提出种种限制刁难条件。此后，又相继发生了长崎国旗事件，这使得50年代中期两国人民和有远见的政治家们好不容易才积累起来的中日经济文化联系全面中断。

2、为打破中日关系僵局的努力

岸信介上台之后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使中国政府和人民逐渐认识到，在其反共反华政策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要改变中日关系的现状，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不能指望岸信介政府，而只有重视政府之外的力量来推动日本政府改变错误立场，为中日关系的修复和邦交正常化的最终实现铺平道路。

中国政府在宣布中断中日间的一切通商、文化联系后，为了打开中日关系的僵局，恢复和发展中日关系，又提出了日本政府必须遵守的政治三原则，这就是：（1）改变敌视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态度；（2）不能继续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3）不继续阻挠中日两国正常关系的恢复或不阻挠中日关系正常化。政治三原则的提出，使中国对发展中日关系的立场更加明确，并使中日两国人民充分认识到中日关系迟迟未能正常化症结所在及解决途径，因而得到了包括日本社会党在内的许多进步团体和日本有识之士的赞同，他们为恢复中断了的中日关系作了许多努力。1959年，日本社会党不仅发表了关于打开中日关系的声明，而且由其委员长浅沼稻次郎率领访华团来到中国访问。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同代表团进行了会晤。另外，日本政界的一些有识之士——以前首相石桥湛山、松村谦三为代表，纷纷率团来华访问，为发展两国人民友好关系共同努力。

同时，他们敦促岸信介政府改弦易辙，拿出修复和改善中日关系的诚意来，并为此采取实际行动。面对日本各界的批评、谴责及发展中日关系的要求，岸信介政府玩弄两面手法，企图以“政经分离”方式，一面仍不放弃敌视中国的政策，一面表示要重视日中贸易，以减少国内民主对日中关系倒退的不满。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政府多次重申，政治和经济必须同时解决，二者不可分离，而且政治必须居于优先地位。

三、民间经济外交的稳步发展（1960年—1970年）

1、贸易三原则的提出与半官半民关系的形成

岸信介的倒行逆施，不仅遭到了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对，也引起了日本国民的日益不满。新日美安全条约批准之日，岸内阁总辞职。新的池田内阁是在日本国民强烈要求日中邦交正常化的背景下上台的，而且，岸信介敌视中国造成的日本国民要求政府改善日中关系的压力，使池田一上台就面临如何对待日中关系的问题。面对日本政局转换，中国在对池田政府的对华政策进行观察的同时，对日态度也在发生变化。

1960年日本日中贸易促进会理事长铃木一雄等应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廖承志的邀请，来华考察中国经济抵达北京。周恩来总理在会见铃木一雄时，首次提出了中日贸易三原则，即“一、政治协定；二、民间合同；三、个别照顾”。中国关于中日贸易三原则的提出，既是对恢复和发展被岸信介破坏的中日经济交流的一种灵活变通措施，也是对池田对华政策的试探和考验。贸易三原则的灵活方式，得到了日本经济界的广泛支持。于是，中国对外贸易史上一种特殊的、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贸易方式——友好贸易顺势产生，成为60年代中日贸易的两种主要方式之一（另外一种为随后产生的备忘录贸易）。友好贸易也就成为60年代中国对日本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日贸易的平稳发展以难以满足日本经济界对扩大对华贸易的要求，他们急切想找到新的有利于扩大对华贸易的途径。于是，1962年6月拟定的一个扩大同中国贸易的新构想，即冈崎构想就孕育而生了。此后，经中日双方不断磋商会谈，与同年底，正式签订了《廖承志和高?达之助关于发展中日两国民间贸易的备忘录（?又称“LT协定”）。该协定是一种介于政府与民间之间的半官方协定，它的签订表明中日经贸关系由民间贸易过渡到了民间贸易与半官方贸易并举，真正体现了中国预想的民间先行，官方挂钩的方针。

尽管池田政府仍坚持政治上不承认中国，采取政经分离的办法处理中日关系，但池田执政后中日关系毕竟有了新的起色，改善中日关系的时期已经慢慢成熟起来。

2、对日态度的强硬与贸易政治化

1964年11月，佐藤荣作组阁。佐藤上台后，不但没有采取改善两国关系的实际行动，反而自食其言，致使中日关系大步后退。对于佐藤在台湾问题、LT贸易问题上引起中国的强烈不满，中国政府迅速作出反应。但中国仍希望中日关系不要恶化下去，并有回旋的余地。但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佐藤政府更加唯美国马首是瞻，在中日关系上，不断人为地制造障碍，表现出对中国的相当敌意，致使中国的对日政策也日趋强硬，中国舆论对佐藤政府开展了猛烈的抨击和谴责。

针对佐藤顽固敌视中国的立场，中国进一步强化了以经济不可分原则处理中日经贸关系的方针，加上这一时期正值“文化大革命”，中国所强调的是政治挂帅，一切服从政治，使中日贸易往来也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这一时期的几次备忘录贸易谈判、友好贸易的活动当然也就不只限于贸易本身，从一定意义上讲，它们已成为这一时期中日关系的一项政治活动，担负起“日中友好”、“恢复日中邦交”、“粉碎安保体制”等政治课题。不过友好贸易的进一步政治化并没有影响友好贸易本身的发展，友好贸易额逐年递增。从事友好贸易的商社和友好贸易人士，也日渐成为支持政治三原则和政经不可分原则，推进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的一支重要力量。

四、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1971年—1972年）

1、中国对日政策的调整与日本复交运动的高涨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尼克松访华，是改善中日关系的两支强大的推进器。这一方面使佐藤政府的既定的反华立场走进了死胡同，另一方面促使日本国内对恢复和中国邦交的呼声日益高涨。

在尼克松访华的前后，中国的对日政策也开始出现了一些调整。在批判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问题上，认为日本军国主义是美帝国主义的“亚洲宪兵”和“奴才总管”；开始由重视民间外交转向官民并举的方针。从这时起，中国对中日官方接触又开始重视起来。

在中国对日政策做出调整的同时，日本国内掀起了空前强大的日中复交运动。在复交运动中，日本促进日中邦交议员联盟、日中友协、公明党等党派和团体，纷纷发表声明、宣言、建议书等，强烈要求佐藤政府改变对中国的错误外交态度，反对其玩弄“两个中国”阴谋，要求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敦促政府改弦更张，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采取切实可行的步骤，给佐藤政府以很大的压力。在各政党、团体开展的强大的复交运动面前，对华一向相对谨慎的财界也开始按捺不住，逐渐加入到复交运动的行列。

2、不以佐藤为复交对手与复交三原则

遭受“尼克松冲击”及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失败，佐藤政府面对日本国内不断高涨的日中复交运动，不得不修改对华政策，表现出欲和中国改善关系的姿态。但他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核心问题台湾问题上陷得太深，顽固地坚持“两个中国”的立场，在中日关系上大耍两面派手法，继续推行他的与中国人民为敌的反华政策。中国基于佐藤的上述立场和对佐藤政治生命行将就木的判断，确立了不以佐藤为复交对手的方针。

为了引导中日邦交正常化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中国适时地提出了中日复交三原则：（1）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坚决反对任何“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等荒谬主张。（2）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已经归还中国。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外国干涉。坚决反对“台湾问题未定”论和策划“台湾独立”的阴谋。（3）日蒋“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复交三原则”抓住了中日关系中最本质的问题，即台湾问题。它的提出，使日本的主要政党、团体及广大国民充分认识到两国邦交正常化的症结所在，对于推动中日复交起了重要作用。

3、中日关系正常化

佐藤辞去总裁后，在日中邦交正常化呼声强大的情况下，主张尽早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的田中角荣上台组阁。田中上台伊始，就一再表示充分了解中国的复交三原则，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时期已经十分成熟，他将为此采取实际行动。对此，中国政府做出了迅速的反应。中日双方就复交谈判的实质性问题举行了多次会谈，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最终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72年9月田中角荣访问中国，中日双方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这标志着中日邦交正常化终于实现了。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是新中国20余年来对日政策所产生的一个丰硕成果，也是对这一时期中国对日政策正确与否的最好验证。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本着和平共处、平等互利的立场，一直致力于改善中日关系，一直积极发展同日本人民的友好往来，并为早日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制定了一系列的原则方针与具体措施。日本各阶层人士和友好人士，包括政界、文化界、经济界的许多有识之士，也不断地为促进中日友好而积极努力，为中日邦交正常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的发表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标志着中日之间长期存在的不正常状态终于结束，中日关系揭开了新的篇章。

中日复交以来，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关系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中日两国友好世代下去，已成为两国人民的共同心声。但是正如两国邦交正常化的折历程一样，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也不可能都会是一帆风顺，在两国关系中，也肯定会出现各种干扰。正因为如此，就中国方面而言，把握时机，制定切实可行的对日政策，引导中日关系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仍是十分重要的。

【参考文献】

- 1、孙平化：《中日友好随想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
- 2、李恩民：《中日民间经济外交》，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 3、罗汉平：《中国对日政策与中日邦交正常化》，北京：时事出版社，2000年。
- 4、张光：《中国的外交政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
- 5、人民出版社编：《中日友好关系的新阶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
- 6、?部?味『中国の?日政策』?京大学出版会、1976年。

7、?部?味『中国外交——政策?定の?造??』日本国???研究所、1983年。

8、田川?一『日中交流と自民党?袖たち』??新?社、1983年。

注释

- ①《周恩来外长关于美国及其仆从国家签定旧金山对日和约的声明》，《日本文件汇编》，第1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年，第33—36页。
- ②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交涉的核心问题集中于民间经济代表是否享有外交特权，具体还包括指纹问题，商务代表机构的人数问题，以及悬挂国旗问题等。
- ③《周恩来总理在接见日中贸易促进会专务理事铃木一雄时谈中日贸易三原则》，《日本问题文件汇编》，第3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第135—137页。
- ④“友好贸易”是指日本友好商社和企业与中国进行的贸易，有时也称为“友好商社贸易”。
- ⑤《日本问题文件汇编》，第4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第90—91页。
- ⑥日本有关团体也深知中日友好协会的这一项于1972年4月11日，由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会长藤山爱一郎，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等各政党委员长和代表以及西园寺公一等著名人士发起，组成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联络会议，以欢迎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访日为当时的共同活动目标。

来源：《现代商业》2010年第9期

编辑：李光文